

# 新中国七十年中华诗词的复苏、振兴与发展

□李文朝

## 新中国成立为中国“旧体诗”带来复苏新生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中华诗词是中国文学艺术宝库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已经创造了文学史上的辉煌。20 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光耀千秋,功垂青史。然而由于当时个别领导者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和民族虚无主义,中国“旧体诗”一度被作为封建主义残渣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不过这条渗透着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打不死的神蛇”,在经历了被打击和冷落之后,生命不息,生机未泯。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旧体诗”的复苏新生提供了无限生机,开辟了广阔前景。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其传统诗词创作的伟大实践,为传统诗词走出低谷、走向复苏开辟了道路。1945 年在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一首《沁园春·雪》轰动朝野,彰显了“旧体诗”惊天撼地的艺术魅力。新中国成立后,在开国元勋和高层文人圈中,不乏用“旧体诗”的形式抒情寄意、酬唱和答者,并时常见诸报端,刷新了“旧体诗”的存在。特别是 1957 年《诗刊》创刊,发表了毛泽东诗词 18 首,昭示着“旧体诗”的复苏新生,并开始走向新的时代。1976 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人们以鲜花和诗歌,而且主要是“旧体诗”为武器,纪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充分展现了“旧体诗”的时代感和战斗性,也预示着“旧体诗”从高端文化人群,开始走向人民大众。事实上,在人民群众中的知识阶层,中国“旧体诗”也一直生机未泯,而且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逐渐“春风吹又生”。

### 新时期中华传统诗词的逐步振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华传统诗词真正挣脱了历史的“羁绊”,催生了中华诗词学会的诞生。1987 年 5 月 31 日,中华诗词学会正式成立。老一辈革命家叶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成立大会上的祝辞中讲到:“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诗词组织。现在,把这个空白补起来了。”中华诗词学会历届领导和同仁,不负党和人民期望,积极发挥全国性诗词组织的作用,筚路蓝缕,砥砺前行,携手前行,扎实推进中华诗词事业的逐步振兴。江泽民、胡锦涛同志都高度重视弘扬中华诗词传统文化,强调中华诗词博大精深,呼唤创造更多更好的“当代诗句”,使广大诗人词家和诗词爱好者深受鼓舞。大家从新时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时代高度,积极抓好诗词队伍建设和当代诗词创作,使新时期中华诗词队伍的组织建设、学术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诗词创作也不断喜获丰收。1994 年 7 月,《中华诗词》杂志社作为中华诗词学会的机关刊物正式创刊,成为团结引领海内外诗人词家和诗词爱好者加强诗词研究,繁荣诗词创作的重要平台。25 年来,这一专业诗词刊物发挥了重要作用,

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了广泛好评。2008 年 3 月,中华诗词学会网站正式开办上线运行,在日渐兴起的网络空间,发出了弘扬中华传统诗词的正声强音,并且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提高。2010 年,中华诗词学会被国家民政部表彰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系统获此荣誉的惟一文学社团。2011 年 9 月,隶属于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中华诗词研究院正式成立,填补了我国国家编制体制内没有一个专门从事诗词研究机构的空白。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华诗词研究院,两个机构,一个目标,共同为振兴中华诗词事业不懈努力。在此期间,全国各地诗词组织都积极主动,戮力同行,共同推动了新时期中华传统诗词的逐步振兴。

### 新时代中华诗词的蓬勃发展

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作为中华民族伟大文化复兴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诗词,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弘扬中华诗词和传统文化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率先垂范,把画意诗情引入伟大的中国梦,把包括中华诗词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认识高度,并亲自赋诗填词,引领时代风骚。《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坚实根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强对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曲艺杂技和历史文化纪录片、动画片、出版物等的扶持。”在党中央强调“加强”“扶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项目中,文学门类里的“中华诗词”被突出置于其他艺术、宣传、出版门类的首位,足见重视程度之高。这使中华诗词界备受鼓舞、激励和鞭策,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大家纷纷组织学习座谈、撰写文章、发表感言,表示要有一种“匹夫有责”的文化自觉性和历史责任感,不负党中央加强扶持的厚望,为繁荣发展中华诗词事业而倾尽全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中华诗词事业蓬勃发展,生机盎然。诗词队伍空前壮大,诗词活动空前活跃。目前,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特区及绝大多数市(地)、县(区)都有了诗词组织,仅中华诗词学会现有个人会员就达 3 万余名,加上各地各类诗词组织成员和广大诗词爱好者,中华诗词大军已有 300 万之众。据不完全统计,海外约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中拥有诗词组织,被称为实力强劲的“海外诗词兵团”。而且诗词创作热情高涨,诗词作品数量繁多。据粗略统计,各类报纸、刊物和正式、非正式出版的诗集,扣除重复部分,全国纸质媒介发表的诗词作品,每年可达上百万

## 全国诗歌座谈会发言摘编

# 出海,是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肖惊鸿



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加大密切相关。新时代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与文学中国的过去相比,以网络文学为典型的中国文学正处在发展最快最好的时代;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发展相较,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正对世界文学版图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网络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影响力不断攀升。理论评论界持续关注网络文学并投入评论研究,为新时代贡献出可喜的研究成果。

网络文学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学谱系,吸纳了西方奇幻文学精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倾注了深刻关切,对人类共同的未来赋予文学的想象和希望。网络文学的创新创造,不仅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张名片,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学成果。在网络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国际交流与对话不断加强,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海外品牌推广不断强化,网络文学作品成为中国精神的载体,网络文学作家成为为人民求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者。随着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版图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生成了一股新的中国网络文学热潮。中国网络文学正以宏大壮阔又深刻入微的中国经验,引领着世界网络文学创造。

在此背景下探讨“网文出海”有着非凡的意义。这不仅关乎中国的文学及网络文学,也关乎世界的文学及网络文学,不仅是对网络文学的历史做一回顾性的总结,也是对网络文学的未来做一前瞻性的研判。中国网络文学出海,既突显了文化学和社会学的价值,也表达了世界文学坐标中的中国经验。

随着科技发展和媒介革命全球化,跨文化传播成为文化领域的突出现象。中国网络文学因其与生俱来的跨文化传播基因,携带着这个时代最独特的文化密码,在创作内容上,不仅传承了中华文明传统,还广泛吸纳了世界先进文化,并以自身的艺术转化和海外传播影响力,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典范,顺应了网络文学国际化发展的需要。

### 出海是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内在诉求

网络文学作为自发的大众的通俗文学的重要样式,发展到今天,以巨大的想象力成就了巨大的表达力,以巨大的传播力铸造了巨大的影响力。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文学文化舞台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类型化创作指征,以及具有广泛认同的丰富多样的内容表达。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新生事物,网络文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时代发展的弄潮儿,从民间到主流,从国内到国外,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文化现象。

如果说,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学承载了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重任,并由此形成重要的社会思潮,那么在新世纪,网络文学已成为文化领域时代潮流的领跑者,甚至可以说,网络文学已成为新时代重要的文化潮流。

伴随着体量巨大的中国故事,网络文学的影响毫不意外地传到海外。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的中国一样,众人书写中国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中,人类从来不是孤独的个体。爱情、奋斗、成功、希望,在人类共同的价值之上,网络文学以无限的想象力汇聚成故事的海洋,故事不但生产梦想,也生

首。加上各地各类网站、微信群等网络诗词作品,更是难以数尽。当然,仅仅诗词作品数量繁多,并不能代表诗词事业的繁荣,但至少可以说明社会参与面比较广,群众积极性比较高,同时在加强诗词理论研究、加大实施精品战略、促进诗词作品质量提高以及加强诗词作品资料收集保存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华诗词“入奖”,即进入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鲁迅文学奖,已经实现了“零的突破”。中华诗词“入史”,即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也已引起领导上和各方面的关注,并经过多方努力,合力推进,相信很快也会“水到渠成”。进入新时代,中央和各地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都加大了对中华诗词的宣传推介力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对中华诗词的宣传力度明显加大。中央电视台季《中国诗词大会》在中华大地男女老少中掀起了诗词热。由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共同主办的“诗词中国”中华诗词创作大赛,参与总量数以亿计。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诗词形式的活跃和诗词数量的繁多,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代表中华诗词的全面振兴与繁荣,必须有代表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和名师大家。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和新时代的要求,促进中华诗词的全面振兴与繁荣还任重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希望大家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于指引新时代的中华诗词创作,有着很强的、非常鲜明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毋庸讳言,相比于新体诗在弘扬时代精神上与生俱来的天然性,中华诗词在紧跟时代步伐、注入时代精神上,显得尤其需要加强和提高。由于传统思维的惯性和习惯势力的影响,那些努力用传统诗词艺术形式反映新时代火热生活的优秀诗词作品,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与激励;而那些故意远离时代、抒发个人小情小调的作品,却在一定范围内饱受点赞与追捧,以致误导年轻诗友的审美追求。当然,个人艺术风格上的“大江东去”还是“小桥流水”,抒发时代情感还是沉吟个人情调,都属于每个人的创作自由,别人无权干涉,但在社会主流审美价值取向的引领上,必须理直气壮地弘扬主旋律,讴歌新时代,同时又要旗帜鲜明地提倡多样化、营造万紫千红的诗国春色。相信通过这次全国诗歌座谈会的引领,乘着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荡东风,中华诗词全面振兴与繁荣的新新局面一定会很快到来。

在中华民族的文学历史中,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始终浸润着中华文化的灵魂,悠悠不息,震响于天壤,贯穿于古今,推动着中华思想文化向前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以至于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文学家。他的长诗《离骚》,是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屈原的人与文,可“与日月争光”(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而不朽。其所由来,并非仅因其作品文采之瑰丽,更因其作品思想之正气。这正气,便是爱国主义的浩然之气,便是情系民众、心怀国家命运,将热爱祖国的一腔热血形诸文字的那种彪炳于史册的崇高灵魂。

已故的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炳正先生曾经说过:“千百年来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和探索,是作为人格理想的追求和完善,是作为民族精神的发掘和发扬来对待的。”(褚斌杰:《屈原研究·百年屈学》,湖北教育出版社)这里所说的“民族精神”,其主要内容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屈原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有明确的是非观念,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从不含糊。他说:“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种严于自身道德修养、为天下苍生而不惜以身殉道的高尚品行,放之四海古今,亦可谓为典型。有人说,作家的才华决定作品的品位,这似乎不错,但我更认为,作家的思想才是决定作品高下境界的最重要因素。一个既无人道情怀、亦无爱国信念的作家,能够写出为人民所喜爱从而传世不朽的伟大作品者,古今中外似乎从未有过。

有人反对文学作品与政治挂钩,似乎一涉及政治,就犯了文学的大忌,就降低了文学的品位,这是一个特大的误解。“政治”者何?无论古代还是当今世界,每个人包括作家,无不生活在社会政治之中,甚至你的衣食住行之状态,也无不与政治有关,更不用说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作家的思想倾向了。如果坚持要说:不,我写的东西是关于“人性”的,是给全人类看的,不是为什么“政治”什么“利益”服务的,是不带政治倾向的。此论看似高雅,其实无论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还是社会思想的角度,都是言不及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于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性(或曰政治倾向性)从不讳言。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说道:“我绝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思想性与现实主义》,第 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思想倾向性,是文艺作品的秉性所决定的,是文艺作品的题中之义,不但无需讳言,且应明确肯定。出自作家头脑的艺术产品,其爱憎是非,不管寄寓是深是浅,文野有何区别,其思想倾向都无法掩盖,批评家对此是不应回避的。

当今小说作品年产生动辄以万计,欲登山高峰,国人翘首,盼待何亟。然而何以出?我想文艺批评应该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在我国文学史中,不仅出现过屈原这样的“惊才风逸,壮志烟高”(《文心雕龙·辨骚》)的大作家,也出现过战国时期荀况那样的大批评家。从荀子写的《非十二子》中可以看到,他的学术思想批评,是何等地广泛而又尖锐深刻。当时思想界名流,无论子思、孟轲、墨翟、宋钘,举凡大儒巨子、硕学名家,荀子对他们的批评,皆直言于笔下,毫无讳避。由于有着这种批评的氛围与“百家争鸣”的文化气场,才催生了战国时期学术繁荣的空前盛况。

批评家的笔,贵在尖锐锋利,如针砭骨;忌在模棱两可,含糊其辞。鲁迅的批评,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批评家的思想修养,比小说家更为重要,因为批评家不仅应该是作家的良师益友,也是作家的“医生”,医生面对形态各异的健康者与病患者,必须要有“扶正祛邪”的义勇担当,要有“治病救人”的人道胸怀。惟有如此,才能使文艺批评成为文艺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批评一事,辨正容易辨伪难。《红楼梦》诞生后十多年,几乎湮没无闻,没有几个人知道它的价值所在,后经时光淘洗,终于成为不世经典。当今有些作品刚一出炉,便被与其意趣相投者匆匆推上荣誉舞台,大加宣扬,出手匆匆,令人迷惘。至于这样的作品,社会读者如何评说,时间老人对它检验如何,则可不必多管多问。最怕这样的作品,被批评家以华丽的语言包装起来,将严肃的批评变成廉价广告,真伪难辨,使人迷惑。正如两千年前荀子对当时某些思想流派批评的那样:“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荀子·非十二子》,中华书局 2016 年版))以古喻今,岂不可以令人警醒吗?

文学是思想表达的艺术,没有思想的文学,或者说没有进步思想的文学,任其行文多么巧妙,笔墨多么“纯粹”,也难以成为钟鼎之音。揆之古人之作,同是观感抒情,李煜写道:“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无言一对春。一壶酒,一竿鱼,快活如侬有几人。”(《渔父》)辛弃疾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前者耽于享乐浮华之私,后者则气象千古,忧国万里;前者令人颓靡,后者使人奋发,两者的“化人”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再如,话剧《白毛女》能激发民众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有助于土地革命的成功;而历史上“四面楚歌”的歌声,则使得楚汉之争的垓下之战,楚军离散,一夕败亡。这就是文艺的作用,就是文艺的“思想倾向”可以“移性”“化人”的最简单最明了的诠释。

梁启超曾经这样说过:“凡谈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缘于小说的这种特殊的“化人”作用,梁启超呼吁:“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梁启超学术论著集·文学卷》:《文论丛录·论小说与群众之关系》,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8 年版)小说的这种“化人”作用,向文学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小说的思想倾向不能忽视,它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意义不可忽视。

尚有可议者。作家有不同的思想倾向,批评家也有不同的思想倾向,故对一部作品,出现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并不鲜见。评论家不是真理的终裁员。倘若批评家对作品的评论,表扬多于批评,或者学理性的泛评多于针对性的具评,便往往流于疏阔玄远,不接地气,读者不知所云,作者也被弄得飘飘如在云雾中游览,只不过享受一番被抬上评坛的满足。如此,批评的助推作用便会大打折扣。在新时代的今天,文学需要大批评家,尤其需要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批评家。肯定杰出之作,批驳伪劣之作,匡正缺失,鼓励创新。这样做来,比一味廉价说好,更能彰显批评家的胸怀气度与责任担当。因为这样做了,是对文学建设的贡献,也是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便是文学之福,国家之福。

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不可分离。对作品的批评,不能只谈艺术,不谈思想。作品的思想,也就是作家的思想。思想的真善美的内涵,既是“人性”的,也是“时代”的。扬善抑恶,让人生与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应当成为一切文艺作品最值得弘扬的永久追求。

# 文学的思想倾向与批评

——从屈原的爱国主义说起

□穆陶